

漢文大藏經的定義、分期及其特點

方廣鋁

漢文大藏經因佛教傳入中國而產生，因漢傳佛教的不斷發展而發展。當今，漢傳佛教依然是影響著東亞億萬人口的主要宗教。在中國大陸，漢傳佛教經過幾十年的蟄伏正在復興，正以前所未有的勢頭迅猛發展，並在發展中不斷地顯現出新的形態。與此相適應，漢文大藏經也正處於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並已進入數字化時代。溫故可以知新，豎往可以知來。在目前這樣一個繼往開來的關鍵時期，我們有必要回顧漢文大藏經的發展歷史，並對漢文大藏經的一些理論問題作進一步的探索。

一、定義

現存的世界三大系佛教，各自傳承自己的典籍，對之各有傳統的稱呼。南傳佛教的典籍被稱為“三藏”，藏傳佛教的典籍被稱為“甘珠爾”、“丹珠爾”，漢傳佛教的典籍則稱為“大藏經”。至於“漢文大藏經”這一名詞，則是二十世紀初由日本學者創造的。他們站在漢傳佛教的立場上，注目三大系佛教的總體，整合各語種佛典，提出“巴利大藏經”、“南傳大藏經”、“藏文大藏經”、“蒙文大藏經”、“滿文大藏經”、“西夏大藏經”等一系列名稱。作為對舉，漢傳佛教的“大藏經”自然演化為“漢文大藏經”。所以，所謂“漢文大藏經”與“大藏經”，祇是歷史、語言的背景不同，其指代對象完全相同。

在中國，人們起初用“眾經”、“一切經”、“經藏”、“藏經”等詞來稱呼所傳承的佛教典籍。如果仔細探究，上述詞彙的出現與衍化，可以反映出中國人對佛教典籍的觀感。約在唐代，出現“大藏經”一詞。這個詞由中國人創造，既吸收了印度佛典管理的內容，又融貫了中國人的思想與感情，本身就是中印文化相結合的產物。不過，在古代，這祇是一個約定俗成的稱呼，人們並沒有仔細研究它的定義。近代以來，隨著佛教學術研究的展開，大藏經也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我們先看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代表性定義：

大藏經 術語。一切經從所入之藏典而謂為大藏經。參見“一切經”條及“藏經”。（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一切經 術語。佛教聖典之總名。或曰“大藏經”。省曰“藏經”。（丁福保：《佛學大辭典》）¹

丁福保定義的文字雖然簡單，但“佛教聖典”一詞留有解釋的餘地。不過，說“藏經”是“大藏經”的省略，不符合歷史。事實是先出現“藏經”，後出現“大藏經”。因此，毋寧說“大藏經”是“藏經”的擴展。

大藏經 包含三藏等諸藏之聖典。又稱“一切經”、“一代藏經”、“藏經”、“大藏”、“三藏聖教”。即以經律論三藏為中心的佛教典籍的總集。（望月信亨：《佛教大辭典》）

望月定義的特點是指出大藏經以經律論三藏為中心，亦即強調了漢傳佛教的印度之根。二十世紀中葉，大藏經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小川貫式主持編纂的《大藏經的形成與發展》，該書未對“大藏經”這一名詞作出定義，但有一段敘述性語言：

佛陀神聖說教的匯集，在印度稱為“三藏”，中國則叫做“一切經”或“大藏經”。……中國佛教在六朝時期，逐漸興盛。這時也興起了匯集整理漢譯佛典、製作佛書目錄的風氣。當時的人，把匯集在一起的佛典稱作“眾經”。六朝末，北方稱佛經為“一切經”和“一切眾經”，江南則稱為“大藏經”，有時也二者併用。這些名稱，不僅祇是佛典匯集或叢書的意思，而是含有一定組織和內容的意義。特別是隋唐時代的佛教界，在漢譯佛典將編入大藏經之先，都必須奏請皇帝敕許或欽定。隨著外來的佛教在中國的國家體制下成為中國的宗教，並佔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中文的佛典以致有欽定大藏經的那種權威與保證。

¹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藏經”條簡單介紹歷代藏經，無定義，故不錄。

上面這段話勾勒了大藏經的發展的基本輪廓，雖嫌粗疏，但攝意較廣。就本文討論的“大藏經”定義而言，它提到“組織和內容”這一值得注意的問題。

二十世紀下半葉與本世紀初，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在此介紹幾種比較重要的著作：

大藏經 佛教典籍的叢書。又名一切經、契經、藏經或三藏。內容包括經（釋迦牟尼在世時的說教以及後來增入的少數佛教徒——阿羅漢或菩薩的說教在內）、律（釋迦牟尼為信徒制定必須遵守的儀軌規則）、論（關於佛教教理的闡述或解釋）。

漢文大藏經為大小乘佛教典籍兼收的叢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

大藏經 又作一切經、一代藏經、大藏、藏經、三藏聖教。指包含三藏等之諸藏聖典。亦即以經、律、論三藏為中心之佛教典籍之總集。（佛光大辭典）

大藏經 又稱一切經，略稱為藏經或大藏。原指以經律論為主之漢譯佛典的總集，今則不論其所使用之文字為何種文字，凡以經律論為主的大規模佛典集成，皆可稱為“大藏經”。（藍吉富主編：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大藏經 簡稱“藏經”，佛教典籍匯編而成的總集。以經律論為主，並包括若干印度、中國等國其他佛教撰述在內。原指漢文佛教典籍，現泛指一切文種的佛教總集。（任繼愈主編：宗教大辭典）

漢文大藏經 漢文佛教典籍總集的通稱。（任繼愈主編：宗教大辭典）²

大藏經是佛教典籍的總匯。詳而述之，它也是綜羅傳世的一切經律論以及經審選後確定的其他佛教撰著，分類編次的大型佛教叢書。（陳士強：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經典卷）

從一般意義上說，所謂佛教大藏經就是指佛教典籍的總集。然而，被稱作“大藏經”的佛教典籍總集，其形成卻是經過中外歷代僧人們長達千餘年精心的創作、發展、甄別、校正、整理而成，它有著豐富的內容、嚴格的序列和精細的結構。（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

上述著作中，前二部工具書對“大藏經”的定義，與丁福保與望月信亨的定義大致相同。第三、第四兩部增加了不同語境中的不同意義，雖不甚準確，但體現了時代特色。而陳士強、李富華等的論述則注意到大藏經的內容、編次與結構。

在此限於篇幅，不擬對上述定義及論述作進一步的評述。但從上述資料可知，學術界至今未對大藏經的定義達成共識。

什麼叫“漢文大藏經”？二十年前，我對此的定義是：“漢文大藏經是漢文佛教典籍的總匯。”現在看來，這個定義不甚準確。所謂“漢文佛教典籍的總匯”，其內涵指漢文佛教典籍，其外延指所有的漢文佛教典籍。雖然漢文大藏經所收均為漢文典籍，但是否全都是佛教典籍呢？是否所有的漢文佛教典籍都能納入漢文大藏經呢？其結論顯然都是否定的。還有，所謂“佛教典籍的總匯”這種提法未能體現漢文大藏經實際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有它的內在的邏輯結構。正因為考慮到古人編纂大藏經有自己的選擇標準，編纂成的大藏經有一定的結構體系，並逐漸完善了一套標誌方法，所以二十年前我在研究中國古代的寫本大藏經的時候，提出大藏經的三要素，即取捨標準、結構體系、外部標誌。但上述對漢文大藏經的定義沒有與大藏經的三要素有機結合起來，所以顯得不甚準確。

在此我將漢文大藏經的定義修定為：

基本網羅歷代漢譯佛典並以之為核心的，按照一定的結構規範組織，並具有一定的外在標誌的漢文佛教典籍及相關文獻的叢書。

² 任繼愈主編《佛教大辭典》之有關條目，內容全同《宗教大詞典》，不贅述。

上述定義用定語的方式，加入大藏經三要素。其中用“基本網羅歷代漢譯佛典並以之為核心”一語表述取捨標準，是出於兩點考慮。第一、以漢譯佛典為核心，已經是漢文大藏經的傳統，必須遵循。這也體現了宗教必須講究傳承這一基本特性。因此，凡是不以漢譯佛典為核心的漢文佛教叢書，可以稱為“續藏經”，稱為“某某集成”、“某某全書”，不能稱為“大藏經”。第二、用“基本網羅”作數量的限定，可以把大藏經與《藏要》等輯要類佛教叢書區別開來。定義中加入“相關文獻”一詞，是為了體現漢文大藏經實際也包括非佛教文獻這一事實。在歷史上，曾有《金七十論》、《勝宗十句義論》之類印度數論、勝論派的典籍收入佛教大藏。上個世紀的《大正藏》特設“外教部”，增收道教、摩尼教、景教的文獻。而新編的《中華大藏經》續編中，計劃增收由古今教外人士撰寫的與佛教有關的著作。上述定義沒有特意突出經律論三藏。所謂“三藏”，實際祇是一種具體的結構方式。在印度佛教歷史上，這一方式並未真正成為所有藏經統一的分類法；在中國佛教的歷史上，這一分類結構也早被突破，進而被日本《大正藏》全面突破。展望未來，這一分類法不可能再維持下去。而“基本網羅歷代漢譯佛典並以之為核心”這一限定，就內容而言，已經把經律論典籍包羅無餘。定義從內涵與外延兩個方面對研究對象作本質的限定，它應該適用於這個對象發展的各個階段。因此，以“三藏為中心”之類祇適用於某一階段的表述，不適用於用作定義。同理，定義也不適用於用作分期的標準。

二、分期

要對漢文大藏經進行科學的分期，首先要確定一個可行的標準。比如對中國佛教，大部分研究者將中國朝代的更替作為分期的標準。我本人不贊同這種方法，主張以佛教本身的發展邏輯來對中國佛教進行分期³。具體到漢文大藏經，它與中國佛教的發展密不可分。我曾經指出，如採用“全息理論”，我們可以說每一個時期的漢文大藏經都反映了那個時代中國佛教的面貌。那麼我們可否將中國佛教的分期套用到漢文大藏經上呢？我以為不可。漢文大藏經畢竟是一種獨立的存在，有自己的發展歷史。我們必須考慮漢文大藏經本身的發展邏輯。

探究漢文大藏經的發展邏輯，就必須考察促成漢文大藏經演化的各種因素。諸法無常，遷流變化。1500年來，漢文大藏經的內容、結構、形態都在不斷地演化。那麼，是哪些因素促成了漢文大藏經的演化呢？我以為有如下五條：

（一）、中國佛教的因素

在佛教東漸以來的漫長歲月中，中國佛教不停變遷。當然，變中有不變，不變中有變，真所謂“大河向東流，天上的群星向北斗”。漢文大藏經作為反映中國佛教的大叢書，從始至終受到中國佛教發展的制約。關於這一點，我在《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中有所論述，可以參看。

（二）、佛教外的因素

所謂佛教外因素，在古代，主要指受中國封建王朝的影響。

自秦漢以來，中國一直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國家。國家權力在中國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沒有任何力量，也不允許任何力量與它抗衡。在歷史上，中國的統治階級既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支持佛教，也曾經因為佛教勢力過於龐大而毀釋廢佛。在政教關係方面，國家政權始終處於主導地位，並力求在佛教的發展中實現自己的意志。

對歷史進行考察，可以發現國家政權對佛教大藏經的干預不斷加深。這件事本身就是國家政權在佛教的發展中逐步實現自己意志的一種方式。

1910年，隨著中國封建王朝的覆滅，封建王朝因素自然不再存在。但佛教外的政治因素、學術因素對大藏經的編纂依然存在著一定的影響。

（三）、編纂人員的因素

不同的大藏經由不同的編纂人員編輯而成。時代不同、地域不同，編纂人員的指導思想、學術水平、編纂原則、編纂方式不同，所編纂的漢文大藏經自然會有差異。

當然，這裡還必須考慮編纂人員的主觀願望與他們所處的客觀現實之間的距離，以及由此產生的互動。

（四）、載體與製作方式的因素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中國書籍的載體逐漸簡牘、縑帛過渡到紙張；書籍的產生方式則由手抄到刻版印刷、活字印刷，近代以來更出現鉛印、影印、激光照排等一系列印刷技術。近

³ 參見拙作《佛教志》。

年數碼技術的發展，更使書籍在載體與製作方式兩方面都面臨前所未有的革命。凡此種種，使書籍的形態，也使大藏經的形態產生重大的變化。

(五)、裝幀形式的因素

佛教傳入中國以來，中國的書籍裝幀有諸如冊牘裝、折疊裝、卷軸裝、梵夾裝、經折裝、粘葉裝、縫續裝、蝴蝶裝、旋風裝、龍鱗裝、綫裝、近現代的洋裝（包括平裝與精裝）、乃至數碼時代虛擬電子書的裝幀等。裝幀形式已經成為修造大藏經時不可迴避的問題，從而成為大藏經研究的内容之一。

在上述五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中國的大藏經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顯示不同的形態。那麼，就分期而言，上述五種因素中的哪一種更適於選定為標準呢？我認為，上述五種因素，從五種不同的角度對大藏經的發展產生影響。如果我們擬從其中某一種角度去研究大藏經，就必須以其中某一種作為分期標準。也就是說，從某種意義上講，上述五種因素，每一種都可以成為我們的標準。但這五種因素作為分期標準相互並不完全兼容，因此無法綜合使用。上個世紀以來，學術界研究大藏經，大體以研究刻本藏經為主，其後對寫本藏經的研究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大藏經歸根到底也是一種書籍。用中國書籍的演化歷程作為大藏經的分期標準也不失為一種方便法門。故本文擬依據載體與製作方式的不同，將至今為止大藏經的歷史分為四個時期：寫本時期、刻本時期、近現代印刷本時期、數碼化時期。

三、特點

就寫本藏經而言，隨著研究的深入進行，如何確定諸多寫經究竟屬於同一部藏經，還是屬於不同的藏經，成為研究的一個難點。就刻本藏經而言，宋以下，刻本藏經的形態已基本固定。近二、三十年來，隨著考古的進展，大量新的刻本藏經被發現。如何確定這些刻本藏經的歸屬，也成為研究的難點。就近現代印刷本藏經而言，目前正處在百花齊放的階段，如何把握其總體特徵，進行分類研究，並理順它們與傳統刻本藏經的關係，已是擺在我們面前不容迴避的問題。至於數碼化藏經的發展方向，更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凡此種種，都是目前大藏經研究領域的新問題。本文力圖在探討各時期大藏經本質屬性的過程中，回答上述問題。

(一)、寫本時期

漢文大藏經的寫本時期可以分為六個階段。

- 1、醞釀階段。大體從佛教初傳到釋道安時代。
- 2、形成階段。大體從釋道安時代到南北朝晚期。
- 3、結構體系化階段。大體從隋代到會昌廢佛。
- 4、全國統一化階段。大體從會昌廢佛到北宋《開寶藏》刊刻。

拙作《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繁體增訂本）對上述第一、第二兩個階段作過簡單的介紹，對第三、第四兩個階段作過詳細的研究。上述四個階段，佔時約 1000 年。

5、與刻本並存階段。刻本初期，流通尚不普遍，故寫本藏經仍是民間的主要流通本；隨著刻本藏經的日益普及，寫本藏經趨於萎縮。故有一個寫本、刻本並存的階段。在中國，這一階段大體從《開寶藏》刊刻到北宋末年；在日本，則延續的時間更長。這一階段中國的寫本藏經，我們現在掌握的有《金粟山藏經》、《法喜寺藏經》等多種。此外還有一大批金銀字寫經。

6、純功德階段。從南宋起，在中國，刻本藏經已經完全取代寫本藏經，成為主要的流通本，但寫本藏經並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它的義理性功能雖然已經萎縮，但信仰性功能卻更加凸現。此時的寫本藏經，主要以金銀字大藏經的形式出現。從現有資料看，直到明清，依然有人修造金銀字大藏經。到了現代，雖然已經無人修造完整的金銀字藏經，但依然有人為了功德而寫經、寫金銀字經乃至寫血經。凡此種種，可以看作純功德階段餘風不絕。近代以來，作為書法藝術而寫經的風氣也開始產生，則是佛教文化進一步普及的一種象徵。可以預期，為功德寫經、為藝術寫經的風氣還會長期存在下去。

上面將寫本藏經劃分為六個階段，其中前四個階段，寫本藏經獨擅天下；后兩個階段，寫本藏經與其它形態的藏經同時並存。進化論告訴我們，事物的進化，有時是漸進，有時是突變。一個物種的不同個體，在進化的道路上步調未必一致。大藏經的演化也是這樣。上述寫本藏經的六個階段，反映的祇是大致的情況，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有時一個階段結束，另一個階段並沒有馬上開始。有時也有不同階段相互交叉。中國的地區不平衡因素，更增加了它的複雜性。因此，所謂分期、分階段，也祇能是一種方便設教。

寫經由人工書寫修造。這一製作方式，決定了寫經的基本特點——唯一性。這種唯一性，

反映在許多方面。諸如：

第一、行款、界欄及整體風格的差異

行款，指每張紙抄寫的行數及每行抄寫的字數。界欄，指界欄的類別，諸如烏絲欄、硃絲欄、刻畫欄、折疊欄、田字欄、沖天欄等等。也指界欄的粗細、規範程度、欄距、上下間距、上邊與下邊的寬度。至於整體風格，比較寬泛，起碼包括字體的類別（真篆隸草）、字跡（恭正潦草）、字品優劣（從每個字來評價）、書品好壞（從整篇文章來衡量）、佈局謀篇乃至制式抄寫與非制式抄寫的區別等等。

由於是手抄修造，所以，如果拿上述標準來仔細衡量，不可能存在兩部完全一模一樣的藏經。甚至不可能存在兩部完全一模一樣的寫經。

第二、文字差異

文字差異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書寫時的增衍、奪漏、錯訛。一是通假字、古今字、異體字、正俗字、避諱字、筆畫增減字、變體字、武周新字的大量出現。前者是書寫者粗心、不負責任造成的。凡是官方寫經，寫後多人校對者，這種情況比較少見。後者由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書寫者的書寫偏好或習慣造成，是無法避免的。由此，兩部規模均在數百部、數千卷的寫本藏經，要想文字完全一模一樣，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三、經文差異

由於寫經時的增衍、奪漏、錯訛，使得不同的流傳本經文不同。這種不同比較簡單，可以通過校勘來解決。更加嚴重的是，有時經文在流傳中會發生很大的變異，從而形成不同的異本。《藏外佛教文獻》收集了若干文獻的諸多異本，雖為未入藏文獻，但可以作為參考。《可洪音義》收入不少已入藏的異本。這種異本影響到後來的刻本藏經。具體事例可以參見《守其別錄》與《大正藏》中的所謂“別本”。

第四、分卷差異

由於用紙、底本等諸多因素，不少經典均有內容雖同而分卷不同的情況。如《妙法蓮華經》有七卷本、八卷本、十卷本的差異。《晉譯華嚴經》有五十卷本、六十卷本的不同。品次的開闔往往也互有參差。較為典型的有《大智度論》、《大般涅槃經》等。

由於經文差異與分卷差異，使寫經出現異本、異卷。以不同的異本、異卷為底本傳抄，形成不同的傳本系統。這是寫經研究必須注意地問題。

第五、內容與結構差異

不同地區、不同時代、不同人修造的寫本藏經，其收經內容、組織結構自然會有差異。這裡又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內容與結構完全不同或基本不同。如隋代以《法經錄》為基礎的藏經與隋智果在內道場主持修造的藏經。一種是內容結構基本相同，略有參差。如敦煌吐蕃時期龍興寺的大藏經與《大唐內典錄·入藏錄》，又如可洪撰寫音義時所依據的幾部藏經。

關於寫經的唯一性，還可以羅列許多表現。詳細描述這些表現，是寫本形態學的任務。在此從略。

由於寫經的唯一性，決定了我們在寫本藏經的鑒別中必須觀其大略，亦即求大同，存小異。具體的方法是：忽略其小節，追索其系統。任何寫本，無論是單獨的寫經也好，寫本藏經也好，都有其底本。底本與抄本，形成一個系統。同一個系統的寫本藏經，就是同一種藏經。

如何鑒別寫本藏經的系統？藏經三要素可以作為切入點。三要素可簡化表述為內容、結構、標誌。在此，內容與結構體現藏經的內在特徵，標誌屬於藏經的外部特徵。任何一部寫本大藏經，都可以用上述三個組成要素來衡量，來檢驗。檢驗的結果，如上述三個要素全變了，藏經當然變了，成為一部新的藏經；如果僅內在特徵變了，藏經實際也變成一部新藏經；但如果內在特徵沒有變，僅外部標誌變了，則應該說這部藏經還沒有變。所以，決定一部寫本藏經的關鍵因素是它的內容與結構等內在特徵。

由於寫本藏經的內容與結構完整準確地體現在它的目錄中，所以，對於寫本藏經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它所依據的目錄。不同的寫本藏經，無論其外部表現形態如何變化，祇要它們的修造依據是同一部目錄，我們就承認它們是同一種藏經。由於寫經本身的唯一性特點，因此，即使它們在收經的內容及結構方面略有參差，也不妨礙它們屬於同一種藏經的身份。例如《可洪音義》所依據的大藏經，與標準的《開元大藏》相比，增加了若干別本，但我們依然把它看作寫本《開元大藏》的一種表現形態。例如敦煌吐蕃統治時期龍興寺大藏經，在《大唐內典錄入藏錄》的基礎上加綴新收經部分，我們依然將它歸為《大唐內典錄》系統。

由於目錄在寫本藏經的研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深入研究各種目錄，仍然是

我們當前的一個重要任務。至於寫經與寫本藏經的傳本系統及其演變，以往很少有人認真研究，今後也應該成為我們注目的方向。

（二）、刻本時期

中國最早的刻本藏經，是刊刻於宋代初年的《開寶藏》；最晚的刻本藏經，是刊刻於清末民初的《毗陵藏》。前後大約也有 1000 年。根據現在掌握的資料，所刻藏經在 20 種以上。雖有官刻、私刻等多種形態；雖然後代藏經收經篇幅不斷擴大，乃至出現《嘉興續藏》、《嘉興又續藏》這樣專門匯聚中華佛教撰著的續藏；但與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發展遲滯、中國佛教逐步衰微相應，這一時期的大藏經的總體結構變化不大。從形態上講，則有從經折裝向綫裝的演變。

與寫本藏經相比，刻本藏經的最大的不同是版刻印刷。與此相應的是，寫本藏經每部每卷經本的形態各不相同，具有唯一性；而刻本藏經，凡用同一副版片刷印出的經本，形態全都一樣。因此，如果說區別諸種寫本藏經的最大依據是其目錄的話，則區別諸種刻本藏經的最大依據是其版片。因為對刻本藏經來說，版片一旦固定，則反映其內部特徵的內容與結構，已全部固化在版片中。加之一部刻本藏經篇幅浩大，僅《開寶藏》的早期刻本就有十三萬塊版片。為了加強管理，以便反復使用，刻藏者創造了版片號，將藏經的外部標誌也固化在版片上。由此，與目錄是我們研究寫本藏經的基礎一樣，版片可以成為我們鑒別刻本藏經的基礎。世有所謂“版本學”，研究的是諸種刻本的區別。刻本藏經所注重的正是版本學。

把版片作為鑒別刻本藏經的基礎，便可以建立這樣一個原則：祇要版片不同，即使所依據的目錄完全相同，哪怕後一部藏經是前一部藏經的覆刻本，我們仍然認為它們屬於不同的藏經。這對於澄清目前學術界對若干刻本藏經的混亂認識具有一定的價值。比如，山西應縣木塔發現的遼代刻經中，究竟有多少屬於藏經，歷來爭論不清。如果我們充分重視版片在刻本藏經鑒別中的地位，仔細鑒別這些刻經的差異，可以發現，真正屬於大藏經的祇有 7 號，其他都是另刻本。又如，遼代藏經有大字本與小字本的區別，此外又有依據遼代大藏經刊刻的房山石經的遼金刻本。如何看待這三種經本的相互關係，學術界始終含糊其辭。確立了以版片作為鑒別刻本藏經的唯一標準後，我們便可以理直氣壯地把大字本、小字本及房山石經作為三種並立的藏經。同樣的道理，《趙城金藏》與《初刻高麗藏》，都是《開寶藏》的覆刻本。但他們都有自己獨立的版片，因此也都是獨立的藏經。

在此講版片是鑒別刻本藏經的基礎，不僅指每一版片的大小、行款、界欄、版片號等具體形態，也指一部藏經所擁有的所有版片的整體狀態。歷代不少藏經都曾有過補雕，如《磧砂藏》、《普寧藏》元代曾經補入秘密經，《永樂南藏》於萬曆年間補入續藏等。此外，由於長期使用，經版難免有損壞等情，此時便需遞修。《崇寧藏》、《磧砂藏》等多種藏經都曾遞修。文物出版社近年刷印《清龍藏》時，也曾經對原有版片進行大規模的整理、補刊與遞修。像這樣，一部藏經版片的主體沒有變動，祇是局部發生補雕與遞修，我們還是承認它是原來的藏經。祇是經過補雕與遞修，出現了新的版本。也就是說，一部藏經，在實踐中除了存在用同一副版片刷印的不同印本外，還可能出現因補雕、遞修等造成的不同的版本。以往人們在研究中往往忽略這一點，今後應該引起注意。

三、近現代印刷本時期

本文將這一時期定名為“近現代印刷本時期”，主要是想區別於古代的刻本時期。因為刻版印刷也是一種印刷術，刻本也是一種印刷本。但近現代的印刷術與古代的刻板印刷術畢竟不可同日而語

近現代的印刷本藏經，按照其採用的方式不同，可以大體分為排印與影印兩種。

屬於排印的，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鉛印，即用鉛活字排版，做成紙型，然後印刷。用這種方式印刷的藏經，日本先後有《弘教藏》、《大日本大藏經》、《大日本續藏經》、《大正藏》等，中國則有《頻伽藏》與《普慧藏》等。另一類是激光照排，即電腦錄入，激光製版，然後印刷。用這種方式印刷的藏經，中國有《文殊大藏經》（中途夭折）、《佛光大藏經》（正在進行）。

近現代印刷本藏經文字清晰，裝幀實用，信息量大。特別應該提出的是，近現代印刷本藏經的出現，與近現代佛教學術研究的興起密切相關。由此新編的藏經，學術含量高。這不但體現在校勘、斷句等方面，也體現在獨具一格的分類體系等。其方便實用與科學，遠遠超過古代的木刻本。因此，其問世不久，便以其無可辯駁的優勢，淘汰掉了古代的刻本藏經。

鉛印與激光照排，雖然方式不同，科技含量不同，但從都要全部重新植字（錄入）印刷這一點講，並無本質差異。由於需要植字，校對精細的，仍難免有疏漏；校對粗疏的，則魚

魯之訛，所在多是。

屬於影印本者，也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不改變底本的編排，完全按照底本的形態，原樣影印。如近年影印的《初刻南藏》、《明北藏》、《清龍藏》、《頻伽藏》均如此。另一類改變了原底本的編排，甚至進行修版、補版。如臺灣的《中華藏》、大陸的《中華藏》均皆如此。

今天，古代藏經基本上已經成為文物。影印本使它們化身百千，既可以滿足寺院供養法寶的需求，也可以讓更多的學者一睹它的真面目。特別是在排印本的行文可能植字致誤時，影印本為我們提供了可信的核對依據。前面提到，研究刻本藏經的基礎使版片。古代藏經保留版片的已經寥若晨星，不過版片的形態基本反映在刻本的印張中。影印本提供了刻本印張的圖版。圖版雖然不能等同原件，但已經大大方便了古代藏經研究者。加之影印本採用現代裝幀，使用方便。如此種種，都是影印本受到人們歡迎的原因。

但是，有些影印本在影印的過程中曾經做技術加工：諸如修版、補字、描白，以及用其他藏經的經本充抵缺失的經本等。一般來講，凡進行加工處理者，均應加以說明。但也有未加說明，或說明不完整者。上述加工，使影印本不同程度地產生失真，有時會誤導研究者得出錯誤的結論，這是需要注意的。

對於近現代印刷本藏經而言，判斷一部藏經是否為獨立的新藏經，其主要依據，還是它的目錄。亦即凡是具有自己獨立的内容與結構者，我們承認它為一部新的藏經，反之則否。用這一標準來衡量近現代印刷本藏經，凡是排印本都可算為新的藏經。排印本需要逐一植字，成本較大；而其製作方式，也給重新編纂藏經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因此，排印本均為新編藏經，這是很正常的。

影印本的情況比較複雜。如前所述，影印本有兩種形態：一種不改動編次，原樣影印；一種改動編次，彙編為新本。前者沿用原藏經的目錄，不變動原藏經的形態，我們將它等同原藏經。其中 20 世紀 30 年代影印的《磧砂藏》較為特殊。由於作為底本的《磧砂藏》有若干闕本，影印時便補入其它藏經的若干另本，並附有目錄，加以說明。《影印磧砂藏》雖然補入了其他藏經的經本，由於有清楚的交代，並沒有造成版本的混亂，仍然可以體現古代刻本藏經的原貌，所以我們依舊將它等同《磧砂藏》。它的補缺部分，實際可相當於古代刻本藏經的補雕。我們用《影印磧砂藏》來命名它，已經表達該藏含有其他藏經經本這一事實。至於改動編次的，可以大陸《中華藏》為代表。大陸的《中華藏》雖然以《趙城藏》為基礎，但全藏收經 9000 多卷，《趙城藏》僅佔二分之一強，其餘全部為新補入的其他藏經的經本，乃至用電腦錄入的經本。對所利用的《趙城藏》經本，也作了較大規模的修版、補版處理。因此，它並非簡單的《趙城藏》影印本，而是一部新的藏經。它的目錄是新編的，與《趙城金藏》也完全不同。有人至今稱大陸《中華藏》為《趙城金藏》的影印本，這是不對的。我們必須承認大陸《中華藏》已經取得獨立存在的權利，成為一部新的藏經。

（四）、數碼化時期

電子技術的迅猛發展，開創了書籍的數碼化時期，漢文大藏經也已經踏入數碼化的門檻。

大藏經的數碼化嘗試，於上個世紀的 80 年代中期就開始了。近 10 年來，取得令人驚嘆的長足發展。縱觀 20 多年大藏經的數碼化過程，我認為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1、初級階段

初級階段的主要特徵是介質轉換，亦即將大藏經由紙介質轉換為數碼。與近現代印刷本藏經的排印本、影印本兩種形態相應，初級階段的數碼化藏經也出現用文字錄入方式形成的電子文本及用圖像掃描方式形成的掃描本。

上個世紀 90 年代中期《高麗藏》率先完成向電子文本的轉換。《高麗藏》轉換的成功為漢文大藏經下一步的轉換工作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後，《大正藏》的轉換工作完成，並迅速在全球的漢傳佛教研究圈中推廣。電子文本的最大優點是實現了全文本檢索，使得以往的“將有關資料一網打盡”的學術界的最高理想瞬間成為現實。海量信息的瞬間儲存與傳播，為各色人等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整部大藏經的掃描，完成於 90 年代後半期。至今，掃描完成者已有《大正藏》、《明北藏》、《清龍藏》等多部。掃描本雖然不能全文檢索，但將浩瀚的藏經轉換為便於查詢的數字圖像，與影印本相比，其優點是顯而易見的。掃描本的完成，為漢文大藏經進入數碼化時期的高級階段準備了條件。

應該指出，在數碼化初級階段出現的電子文本與掃描本固然有眾多優點，但由於它基本上祇是紙介質的簡單轉換，因此，上文提到的排印本與影印本的諸多缺點，也同樣存在於電子文本與掃描本中。此外，電子文本的大藏經還存在如下兩個問題：

第一、電子文本的不同版本問題

初級階段的早期，人們對電腦錄入佛典乃至整部大藏經具有極大的熱情，許多人都在這一領域奮發努力，我曾經著文形容是一派萬馬奔騰的局面。不同單位完成的電子文本，質量不可能劃一。這樣，同一部《大正藏》，出現質量參差不齊的好幾個不同版本的電子文本。不過，近十年來，經過資源的整合及優勝劣汰的自然競爭，中華電子佛典協會製作的《大正藏》的電子文本已經得到大家的公認，其他版本逐漸趨於湮沒。

與此相應的是，中華電子佛典協會早期的電子文本的錄入錯誤較多，其後隨著不斷地校改，那些錯誤逐步得到訂正。這樣，早期的電子文本與其後的電子文本有著一定的差異。由於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電子文本大藏經是逐步發佈的，這就造成社會上流傳的電子文本有著各種各樣不同的版本。非專門從事這項工作者，一般不易區分這些不同版本的差異。

第二、電子文本的公信力問題

中國有一句俗語“口說無憑，立字為証”。落在紙面上的東西不能隨便更改，於是取得一定的權威性。電子文本易于修訂，這本來是一個優點，可以使它不斷改進，臻於至善。實際上，後期的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電子文本《大正藏》指正了《大正藏》原本不少排印的錯誤。但易于修訂又是一個缺點。因為易于修訂，文本形態流動性大，使得電子文本的公信力難以形成。當前，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電子文本《大正藏》已經在佛教研究者中通行，但嚴謹的學者在標註引文出處時，必定要去查核《大正藏》原文，並標註《大正藏》原文出處。所以，如何使電子文本建立公信力，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這當然不是佛教研究界獨自的問題，它與全社會對電子文本的觀感緊密相連。我認為，建立電子文本的版本號，也是使它逐步取得公信力的途徑之一。

初級階段出現的電子文本與掃描本，都是前此某一部藏經的簡單轉換。由於它們都依托於前此的藏經，因此，本身沒有取得獨立的地位，不屬於新的藏經。其判別的標準，依然是各自的目錄。

2、高級階段

高級階段的主要特徵是超文本連接，亦即將不同的數據資料通過超文本連接的方式，出現在同一個屏幕上，滿足讀者的不同需求。我個人以為，這大概也可以分為兩種層次，即低層次的一般的超文本與高層次的互動的超文本。

所謂一般的超文本，可用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2004 年 4 月製作的《電子佛典集成》為代表。該《電子佛典集成》的底層支撐是《大正藏》前 55 卷、第 85 卷及《新纂續藏經》史傳部 10 卷。但其桌面結構採用以疏隸書的新的原則。它不僅在內容、結構等方面都發生變化，而且提供了一些傳統藏經所沒有的功能，網上藏經的一個很好的嘗試。

所謂互動的超文本，則是我設想的一種由讀者參與，充分互動的網上藏經形態。我曾經在《資訊時代的佛教目錄》中對這種形態的藏經作過一些探索。這裡限於篇幅，不再展開論述。

漢文大藏經的數碼化對佛教學術研究促進之大是無可估量的。同時，它也對研究者本人的學術素養提出新的要求。這不僅表現在我們必須熟悉和學會使用數碼化藏經，更表現為它將大大提高學術研究的質量。舉例來說，以往研究，收集資料是一項耗費巨大精力，但必須去做的基本功。為了把有關資料一網打盡，研究者往往兀兀窮年。一本書、一篇文章，如果羅列大量的相關資料，往往會得到人們的稱讚，認為是學識淵博。在數碼化時代，這一切將完全改觀。資料的搜尋已經不再是難事，資料的羅列祇說明此人對電腦操作得很熟。研究者的功力將更多地放到對資料的研究與分析，用最充要的資料、最貼切的方式來論證問題。這對目前的研究方式以及科研成果評價體系都將是一個挑戰。

目前，漢文大藏經正在邁入數碼化時期的高級階段。全球的信息數碼化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飛猛進。數碼化大藏經將如何進一步發展，目前還不能說得很清楚。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在數碼時代，我們衡量藏經的標準會發生全新的變化。將來的標準，既不是收經內容，也不是組織結構，更不是外部標誌。所謂“大藏經的三要素”，在大藏經數碼化時期的高級階段將被揚棄。衡量一部數碼化時期大藏經水平的高低優劣，將主要看它所蘊含的信息量的多少以及它能夠提供給使用者的解決問題的手段的多與強弱。這將是一個質的飛躍。我曾經撰文，主張理想的大藏經應該同時具備義理型、信仰型和備查型等三種形態。但過去的藏經，很難達到這種理想的狀態。數碼化將使這種大藏經的出現成為現實。讓我們舉起雙手，迎接這一偉大的時代吧。